

乳业新国标论战冲击波

■ 本报记者 田晶 / 文

乳业新国标之争,以“奶业大炮”王丁棉为震中,震波迅速扩散到业内人士、消费者乃至海外。继三聚氰胺事件、“圣元性早熟”事件之后,这场地震再次冲击了人们对乳业市场的信心。

王丁棉炮轰新国标,结果引来不同角度的还击。

先是内蒙古奶业协会负责人那达木德宣称“现行乳业标准符合中国国情”,紧接着方舟子指称“王丁棉是广东巴氏奶企业的推手”,在“妖魔化常温奶”。

“他(指王丁棉)这是外行指导内行,根本不了解全国的情况。他说的标准只适合南方的企业,不适合北方。”河北福成五丰牛奶场总经理张方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低标准说法 冲击投资者与消费者信心

“真正的危机是大家对国内乳制品的信心缺失。两大阵营的争论实际上是揭行业内幕,这会引发并误导消费者认为国内乳品是按最差标准生产的,从而引发对该行业整体食品安全的担忧。”中山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林景新教授表示。

“每天提心吊胆,生怕出什么事,市场环境又不好,很可能本钱都打不回来,现在还有谁愿意投资这个行业?”张学说完又补充了一句,“谁投资谁是傻子。”

这名经历了乳业十余年浮沉的老兵,把三聚氰胺事件后的乳业市场形容为“刚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但只是短暂的一亮”。

“你能想象吗,五六年前唐山一头奶头可以卖到6万多元。”张学点上一支烟,眯着眼回忆起当年乳业发展盛况。

彼时,各路资本蜂拥而入,房地产开发商、山西煤老板、唐山铁矿老板都在投资建设牧场,高薪挖角。从2004年到2006年,在资本推动下,中国乳业经历了第一次自发的规模化养殖高潮。与此同时,乳产品市场也经历了爆发性的增长。

以三聚氰胺事件为拐点,中国乳业一路走低。

“圣元的性早熟事件,又给了市场当头棒喝。好在最终证明是进口的奶粉出了问题,之后市场慢慢恢复了一些信心。”张学说。

这就是他所说的“短暂的一亮”。然而,肇始于去年的乳业新国标之争,让乳业前景再次陷入晦暗之中。

乳业新国标从起草、制定到颁布,始终有两派阵营争论不断。其中,南方派是以王丁棉为代表的巴氏奶阵营,坚持以巴氏奶标准制定标准,并以此攻击新国标;北方派则是以金海、那达木德为代表的常温奶阵营,打着维护奶农利益、符合国情的旗号下力挺新国标。

让张学感到忧虑的,不是投资人失去兴趣,而是消费者可能因此彻底丧失对国产乳制品的信心。

“真正的危机是大家对国内乳制品的信心缺失。两大阵营的争论实际上是揭行业内幕,这会引发并误导消费者认为国内乳品是按最差标准生产的,从而引发对该行业整体食品安全的担忧。”中山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林景新教授表示。

北京一位刘姓女士近日来一直在关注乳业新国标的争论,并因此获知,巴氏奶与常温奶的区别居然如此之大。

她是一个四岁半男孩的母亲,每周逛两次超市,都会为家人选购牛奶、酸奶和奶酪等乳制品。而在7月2日这个星期六的下午,当她从北京南三环附近一家大型超市出来时,购物袋里没有任何一件乳制品。

“我们到底应该喝什么奶?”她问道。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疑问。在刘女士经常登录的网络论坛里,数以百计的妈妈们在讨论相似的问题:什么是巴氏奶,应该选择哪个品牌,常温奶还能不能再喝?

其中很多人表示,刚刚恢复了一些对国产品牌的信任,现在看到“喝低标准牛奶不如白开水”的言论,感到越是大品牌越信不过,这个行业太乱了,干脆“都别喝了”。

调查显示,消费者对国内乳制品信心低迷。2010年,全国36个大中城市居民人均乳制品(包括鲜乳品、奶粉和酸奶)消费量为24.03千克,同比减少5.3%。

杀牛卖牛真相: 奶农利益被乳企巨头挤压

“乳企利润在暴涨,奶农利润在暴跌,这轮整顿后,几大乳企在大部分



关于乳业新国标的争论,引发了消费者的恐慌,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投资者信心,中国乳业面临再次陷入恶性循环的危险。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张学表示:“关于新国标,我的观点是,在中国现有条件下,让大部分乳企符合标准,将少数不符合标准的挡在门外就行了。主要抓住安全标准,而不是蛋白质含量这类营养标准。”

“现在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标准的问题,而是奶农的生存问题,这才是乳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张学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出台有效政策,避免奶贱伤农的局面继续蔓延。

分地区形成了价格垄断,其结果是,越是垄断严重的地方,奶农利益受损越大。”张学表示,“几个大乳企,现在就像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家奶牛养殖基地的负责人石先生告诉记者,对照生乳标准来看,奶牛场如果努力,加强饲养管理和卫生管理,要达到高标准也不是那么困难。

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大部分养殖场的饲养模式都是“集中挤奶、分户饲养”,分户饲养意味着环境卫生不好控制,因此菌落数就不好控制,加上夏季气候炎热,奶牛会喝很多水,也会降低蛋白质含量。

调查显示,我国60%的奶牛由存栏20头以下的小规模户饲养,生产设施简陋,卫生防疫条件不完善。

石先生告诉记者,如果有生乳中菌落总数指标调为每毫升50万CFU(菌落形成单位),每百克生乳的蛋白质含量为大于等于2.95克,提高生乳收购门槛,这些奶牛养殖户很有可能因为达不到标准、卖不出去奶、利润降低而杀牛。

他认为,如果采用高级饲养模式,建成大型集中养殖场是可以达到高标准的,但这种模式的推广成本很高,企业的成本压力会很大。

内蒙古奶业协会秘书长那达木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如果中国现在按乳业发达国家标准执行,那么占总量70%的散养殖户绝大部分要倒奶、卖牛或杀牛。

提高标准会导致奶农杀牛卖牛的说法遭到很多人抨击,被认为是滥用奶农利益“绑架”新国标。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杀牛、卖牛现象,但原因与乳业标准无关。

张学告诉记者,经过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的乳业整合,乳业生产加工能力相对不足,对乳业产业链造成了新的伤害。

“乳企利润在暴涨,奶农利润在暴跌,这轮整顿后,几大乳企在大部分地区形成了价格垄断,其结果是,越是垄断严重的地方,奶农利益受损越大。”张学表示,“几个大乳企,现在就像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在6月中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奶业大会”上,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奶业协会会长高鸿宾表示,在乳品加工方面,部分企业重市场开拓、轻奶源基地建设,争抢奶源、压级压价现象交替发生,影响了生乳正常收购秩序。

据张学介绍,去年同期冀东地区的生乳收购价每公斤在4.63元左右,而今年降到了4元以下。与此同时,奶牛养殖企业和养殖户的饲料、人工等各项成本均在上漲。

“像我们这样的规模化养殖场还能挺一挺,奶农多半已经挺不住了。”张学告诉记者,在河北省廊坊市等北京周边地区,已经出现了奶农被迫杀牛卖牛的情况,而这一情况在东北地区更甚。

张学表示:“关于新国标,我的观点是,在中国现有条件下,让大部分乳企符合标准,将少数不符合标准的挡在门外就行了。主要抓住安全标准,而不是蛋白质含量这类营养标准。”

“现在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标准的问题,而是奶农的生存问题,这才是乳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张学认为,

当务之急应该是出台有效政策,避免奶贱伤农的局面继续蔓延。

分级标准设想: “以质论价”破解收购难题

新国标制定的只是行业“最低标准”,是一个奶源合格的“入门门槛”。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大乳企都有其企业标准,一般会比国家标准高,尤其是大型乳企往往会采取国际标准、欧盟标准。在奶源收购上,也会设定等级,按企业需求收购奶源。

张学认为,由于乳企形成区域性垄断,往往会对生乳收购一个平均收购价格,而按照规范生产的养殖企业,也只能按照平均价获得收益,这有失公平。

“毫无疑问,新国标还需要进一步修正、细化,对生乳进行分级收购很有必要,对达到不同等级指标的生鲜乳可作不同的用途。”张学建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乳品安全标准工作专家组组长王竹天研究员也表示,卫生部依法正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并将根据跟踪评价意见对标准进一步修订完善。

乳品安全标准工作专家组成员、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上海)教授级高工孟瑾表示,新公布的《生乳》标准总结该收购标准实施多年的经验,将生乳中菌落总数指标从每毫升400万CFU调整为200万CFU,提高了生乳收购门槛,要求更加严格了。

“随着奶牛养殖业的发展和养殖水平的提高、养殖环境的改善,生乳菌落总数会逐步降低。国家鼓励企业在生乳收购中设置菌落总数分级收购标准,引导奶农标准化规模养殖,不断提高生乳质量,我们也将根据产业发展状况及时调整相关指标。”孟瑾表示。

孟瑾提示,《生乳》标准中蛋白质含量指标是生乳收购的最低要求,乳品企业根据优质优价的原则收购牛乳,将不同蛋白质含量的生乳用于不同类型乳品产品的生产,其产品必须达到相应乳品产品国家标准中蛋白质含量规定后方可出厂上市销售,例如《巴氏杀菌乳》、《灭菌乳》等标准中规定每百克乳品中蛋白质含量不得低于2.9克。

孟瑾表示,为进一步鼓励奶牛科学饲养,推进生乳收购“按质论价”的进程,农业部正在着手制订生乳分级标准,引导乳品加工企业合理使用不同等级的生乳生产差异化乳品。

实际上,新国标制定的只是行业“最低标准”,是一个奶源合格的“入门门槛”。记者在采访中,各大乳企都有其企业标准,一般会比国家标准高,尤其是大型乳企往往会采取国际标准、欧盟标准。在奶源收购上,也会设定等级,按企业需求收购奶源。

上述石先生透露,蒙牛有自己的生乳收购标准,它根据牛奶中菌落数和蛋白质的含量把牛奶分成了几个等级,比如菌落数每毫升50万CFU、100万CFU、150万CFU、200万CFU分别是不同的等级,每百克生乳蛋白质含量低于2.95克以下是一个价格,高于2.95克又是一个价格。

能源“金三角” 同质化隐忧

“金三角”内各地区都以煤为主,都把煤化工列为发展重点,必然会出现同质化竞争,进行重复建设,而且每个地方都想做对方的下游,以求减少污染,关系比较难以处理。

■ 本报记者 张龙 / 文

中国能源界习惯用“金三角”称呼蒙陕甘宁交界地区,这一地区的能源规划战略正在提速。

“目前,《蒙陕甘宁能源‘金三角’综合开发指导意见》编制工作确实已经完成,正在等待上报国务院进行审议,但短期内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一位权威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高世宪表示,蒙陕甘宁能源“金三角”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解决鄂尔多斯盆地能源资源良性开发的问题。

数据显示,2009年,鄂尔多斯能源盆地原煤产量占全国的20%,油气当量占全国近18%,天然气产量占全国14%。

而另一位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都在酝酿并编写区域性的能源规划,有不少规划都已经上报到了国家发改委。这种区域性能源规划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都存在着同质化发展的隐忧,国家发改委的审批会比较谨慎。

项目驱动政策: 区域性能源规划“各自为政”

上述权威人士告诉记者,未来还将有一系列的区域性能源规划出台,包括青海以及新疆区域规划。这些规划和“金三角”规划差不多,也以煤化工项目为主。

尽管主管部门在逐渐收紧和规范煤化工项目,但主要的煤炭资源区和大型能源企业都已经制定了未来5至10年的煤化工发展和投资规划。其中,新疆、内蒙古、山西、陕西、贵州、宁夏将是未来煤化工大发展的主要省份。

上述权威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在将来会基本形成“五区一带”的能源开发布局。

据了解,“五区”是5个综合型的能源开发基地,分别为陕西、鄂尔多斯盆地、西南、东北(主要是蒙东)、新疆,“一带”则是中东部的核能带。其中鄂尔多斯盆地包括蒙陕甘宁4个省份,也就是所说的“能源金三角”。

“十二五”期间,“五区一带”的能源供应量占全国80%以上,增量占全国90%以上。”该权威人士说。

事实上,地方政府都热衷于支持传统能源的发展。在中国中东部地区,有些地方政府虽然都在积极发展新能源规划,但对传统能源支持的力度非常大,这并非体现在规划上,而是体现在实际行动上。

无锡一家做基础油加工的企业负责人狄经理告诉记者,公司在无锡的年生产能力只有20万吨,后来准备到外地扩建,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今年在北方和南方各有一家分厂将会投产,年生产能力将会达到40万吨。当地政府是可以保证当地的油料供应,提高进出口额,所以很支持。能源行业是一个需要高投入的行业,这两个分厂的投资额均为3000万美元,这也是当地政府很看重的。”狄经理说。

狄经理同时表示,除此之外,当地政府也在积极引进一些能源企业,形成规模,最终也会编写一个能源规划,这样有利于向上面要政策。

“如果政策能被批准,肯定有利于我们企业的发展。”狄经理说。

内蒙古有关人士也曾公开表示类似观点:内蒙古打造的国家能源基地,将给予当地能源企业诸多优惠,其中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对煤矿等矿产开采权限的部分放开,新上项目审批可能会更加宽松。

有专家表示,能源战略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已制定并正在调整自己的能源战略,但中国至今尚未确定能源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编制能源规划,导致能源发展整体不平衡,实践中每每出现项目驱动政策,而不是政策驱动项目的情况,更难以使能源发展与经济发展、环境、资源相协调。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发展规模,在没有统一部署的前提下,出台自己的能源规划,推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跑马圈地、无序发展。

缺少统筹规划: 煤化工出现重复建设苗头

“‘金三角’中的鄂尔多斯、榆林和宁东三地的资源结构非常类似,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煤化工为主。”高世宪说。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政策研究部主任张宏:“目前,榆林地区在着力打造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鄂尔多斯提出了煤炭就地转化率必须达到50%以上的要求,大力发展煤制油、煤制烯烃等项目;宁东则更明确,2009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了《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开发总体规划》,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三地都以煤为主,都把煤化工列为发展重点,必然会出现同质化竞争,进行重复建设,而且每个地方都想做对方的下游,以求减少污染,关系比较难以处理。”上述权威人士称。单一的结构还面临着重复建设的困境。

目前,“金三角”地区各地市以煤炭为基础的产业发展路线趋同,发展煤电、煤化工产业是各地市的共同选择。2015年,“金三角”地区煤炭规划总产能达12.1亿吨,高于国家能源“十二五”规划拟定的11亿吨目标。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延生说,国家有关部门有关煤化工行业规范的通知近几年发布了不下4次,并且已经将煤化工的审批权上收到国家层面,在规模上更提高了煤制甲醇的门槛。

尽管政策严厉,但依然挡不住地方政府对煤化工的热情。张宏表示,“金三角”区域内煤炭资源开发程度也有较大不同,鄂尔多斯的神东、准格尔矿区已形成了规模化开发,榆林地区煤炭开发规模快速扩大,宁东地区也已初具规模;上海庙基地则刚刚开始建设,总体上讲,这些地区都是优质的整装煤田。

“应该由国家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有序开发,而不能从单个煤矿、单一矿区出发。要在资源开发规模、资源利用方向、下游产业布局和产品延伸发展等多方面协调发展,防止无序开发和产业雷同发展,这也有利于国家大型整装煤田的保护。”张宏认为。

在同质化竞争的同时,“金三角”地区还存在产业基础薄弱这一国内能源基地的共性问题。

国家有关部门对“金三角”地区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金三角”地区产业体系尚显单一,能源资源深度转化、精细化工、装备制造、现代物流和金融服务等下游或配套产业发展滞后。输出的能源产品多为初级产品,深加工产品种类少,规模小。